
中华民族的凝聚与演进*

——从“民族”角度认识中国历史

石 硕

摘 要: 中华民族是历史形成的,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文章以历史上中国的“扩大”与“绵延”为基本线索,对中华民族的凝聚与演进,尤其对华夏农耕民族与北方民族的交融汇聚机制、北方民族不断南下对民族融合的推动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文章认为,民族融合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基本趋势是朝彼此依存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密不可分整体方向演进,这个整体正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华民族”。民族融合是中华民族形成凝聚的根本,也是中华文明得以绵延不绝、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的关键所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之所以成为可能并持续不断,其精髓与核心在于包容。中华民族的凝聚与发展,正是历史上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包容和彼此接纳的结果。

关键词: 中华民族 华夏农耕民族 北方民族 民族融合

中华民族是历史形成的,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要了解中华民族为什么形成,我们必须回到中国历史场景与话语中。因此,我们需要从“民族”角度认识和考察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笔者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还鉴于一个事实,这就是“中国民族史”的书写一直存在视野相对狭窄的问题。今天,我们见到的许多版本的《中国民族史》,大多是书写历史上周边“四夷”的历史以及今天 55 个少数民族的历史。这样的书写模

* 本文系中央四部委批准设立“四川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专项研究成果。

式带来两个问题。其一,《中国民族史》的书写一般不包括历史上的“汉人”,即今天的汉族,所以读《中国民族史》,我们无法了解中国人口数量最庞大的汉族的历史。其二,既然不包括“汉人”的历史,《中国民族史》的书写中自然也较少(至少不是主要内容)反映历史上少数民族与汉人群体之间的交融互动,而这恰恰是中国历史发展中最重要的一环。这样的视野和分割带来很大的局限,它不能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由何而来,我们也难以看到中国历史上民族演进发展的整体格局与全貌。笔者认为,要了解中国历史上民族的全貌,除了读《中国民族史》,还要读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此文虽然篇幅不长,但却是完整意义上的“中国民族史”,它清晰地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是由何而来的。^①事实上,数千年的中国历史实为一部民族史。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曾明确指出:“民族为历史之主脑”。^②所谓“汉人”,正是中国历史上长期民族融合过程产生的一个庞大的民族共同体。所以,“中国民族史”的书写如果不包括“汉人”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就会有很大的局限。

“中国历史”的概念大体包括以下三个层次:

- 1.从民族范畴来说,它是“中华民族”聚合的历史。
- 2.从文化综合体的范畴来说,它是“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历史。
- 3.从“国家”的概念来说,它是今日中国之由来。

首先需要指出,史籍记载中的“中国”与今天的中国概念不在一个层次上,二者不能同日而语。中国的形成如同一条河流,除了主流之外,中途不断汇入各个支流,这些支流不断壮大着中国,最终形成今天概念的中国。所以,“中国”与“中国历史”概念并不等同,二者是需要加以分辨的。

中国历史演进是“中华民族”聚合与中华文明形成的历史。诚如钱穆所言,中华文明的伟大主要体现于“扩大”与“绵延”。^③“扩大”是贯穿中国历史演进的一个总趋势,由分散到统一,由局部到整体,由互不相干的“多元”走向“多元一体”,这是中国历史演进的基本特征。“绵延”则是指中国的文化、民族与疆域及统一,数千年来一直代代相传,绵延不绝,为世界历史所罕见。下文中我将以“扩大”与“绵延”两个基本线索为切入点,大致勾勒出中华民族聚合与演进的历史过程。

^①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第1-19页。

^②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页。

^③ 钱穆在讨论中国文化时指出:“中国文化,无疑为世界现文化中最优秀者。取证不在远,请即以中国文化之‘扩大’与‘绵延’二者论之。中国文化拥有四万万五千万大群,广土众民,世莫与京,此即其文化伟大之一证。”参见钱穆《文化与教育》,《钱宾四先生全集》第41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1页。

一、中国缘何扩大？

先来看中国如何扩大，是什么成就了中国之大？

中国历史演进的基本模式是“统一”与“分裂”相交替。据葛剑雄先生的统计，分裂时期总体较统一时期要长。^① 若我们以“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的秦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开端，那么中国历史上大的分裂时期主要有两个。

第一，从东汉末至隋灭陈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其间虽有西晋的统一，但时间很短，仅 51 年，如昙花一现。这个时期分裂持续近 400 年，造成这一时期割据分裂局面的，除三国外，最主要的因素是北方民族大举南下入主中原地区，亦即中原人语境中的“五胡入华”。^② 这一时期，长江以北先后出现十六国及北魏、东魏、西魏和北齐、北周等众多割据政权，多是由北方民族（即所谓“胡人”）建立。长江以南则相继出现了吴、东晋、宋、齐、梁、陈等六个政权的更迭。

第二，五代十国、两宋及辽、金、西夏时期。这个时期持续 300 多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南北朝时期。^③ 这一时期造成分裂局面的原因同样是民族因素。由北方民族建立的辽、金、西夏等政权不但与北宋和南宋相互并立，而且先后对北宋和南宋构成极大的威胁和冲击，导致两宋时期政治、经济重心不断南移。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突出特点——中国历史上两个大的分裂时期，主要由民族因素所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分裂局面主要是北方民族南下即所谓“五胡入华”造成；五代宋辽夏金的分裂局面同样是北方民族契丹、女真、党项、沙陀等崛起，建立政权并不断向南扩展的结果。我们不难发现，通常所说的分裂时期，大抵都是北方民族大规模兴起并南下中原建立政权和统治的时期。因此，历史上所谓“分裂”时期，事实上也是北方民族大举南下形成的民族融汇时期。

自秦以来，与分裂时期民族交汇相对应，中国历史上有五个大的相对统一时期，即秦汉统一王朝、隋唐大一统、元朝的统一、明朝和清朝的大一统。从宏观角度审视，我们可以看到这五个统一时期有两个突出现象。

^① 参见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4 年版，第 79 页。

^② 唐宋人曾将这一时期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称作“五胡乱华”，这是一种以农耕民族为本位的说法。对此，前辈学者马长寿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去传统的史学界把五胡十六国的历史说成是‘五胡乱华’，这种说法现在看来显然是不公允和不正确的。主要的错误在于没有承认五胡是当时国内的少数部族，把国内民族的矛盾问题同国外部族的入侵问题等同起来，所以引出‘五胡乱华’的错误结论。”马长寿：《北狄与匈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00 页。

^③ 参见陈述《辽金两朝在祖国历史上的地位》，《辽金史论集》第 1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 页。

第一,这五个强盛的统一王朝均出现于分裂时期即民族融汇之后。秦汉统一王朝是在春秋战国夷夏蛮狄大融汇之后出现的;隋唐统一王朝是在魏晋南北朝近400年的分裂即民族大融汇之后出现的;元朝是在五代宋辽夏金即汉、契丹、女真、蒙古、党项等各族大融汇后出现的;明朝的情况略有不同,从形式上看它是承继元朝大一统之后出现的一个统一王朝,但从文化上看,明朝的统一同样是以民族融汇与整合为基础——它是元朝所划分的“四等人”经过近百年的进一步充分融合之后出现的;清朝的统一则是在明中叶以后汉、蒙、满、藏、回各民族融汇之后出现的。

第二,从中国历史上五个统一王朝的民族面貌看,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重要事实,即北方民族的作用在明显递增,农耕民族的作用在不断下降。如果说,秦汉统一王朝大致以农耕民族为主体,但经过魏晋南北朝近400年民族融汇之后产生隋唐统一王朝,情况已发生很大改变。据陈寅恪先生研究,隋唐统治集团大多出自“北方胡统”^①,唐代华夏与夷狄界限相当模糊,对蕃将的普遍使用、妇女地位较高及“尚胖”的审美等均带有浓厚北方民族特征。^②正如费孝通指出,唐朝“名义上汉族统治,实际上是各族参与的政权”。^③在唐以后,除了明朝是对蒙古南下建立元朝近百年统治的一个反弹——大体是以华夏人群为主体建立的统一王朝外,元朝和清朝则均是北方民族入主建立的统一王朝。西藏以及整个青藏高原与蒙古地区纳入中国版图,均得力于二者。这两个囊括中国全部版图的统一王朝基本奠定了今天中国的版图构架与民族格局。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中国历史演进与政治格局的重组过程中,北方民族表现得更为活跃,而且愈往后北方民族所发挥的作用愈突出,呈不断递增的趋势;相比之下,中原农耕民族的作用则呈现下降和减弱趋势。

综上,中国历史演进脉络之所以呈现出“分裂”与“统一”不断交替,根本原因是民族因素所致。历史上所谓分裂时期,大多数是北方民族大举南下入主中原并在中原建立政权的时期。因此,无论是魏晋南北朝还是五代宋辽夏金时期,都是新一轮北方民族大规模进入中原地区的时期,也是新的民族成分汇入、融汇的时期。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时期往往是各种民族成分逐步消化与融合时期。一般来说,经过统一王朝后,往往先前存在的许多族名逐渐消失,不再见于记载。^④分裂时期所融汇进来的众多民族成分,往往也给统一王朝注入强大的生命力。诚如费孝通先生谈及唐朝所言:

①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38页。

② 参见陈寅恪《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1957年第1期,第163-170页;章群《唐代蕃将研究》,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段塔丽《唐代妇女地位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③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第8页。

④ 如中国历史上的匈奴、鲜卑、羯、氐、突厥、契丹、女真等族名均是如此。

“唐代不能不说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高峰。它的特色也许就在于它的开放性和开拓性。这和民族成分的大混杂和大融合是密切相关的。”^①需要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北方民族南下入主中原既是造成分裂的原因,同时也往往成为重新构筑统一的强大力量。这在唐以后的元、清两个朝代体现得尤为突出。

综上所述,对于“什么成就了中国之大”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认识。

1.北方民族一浪又一浪地南下伴随了中国历史的始终,他们不断重组中国的版图与民族格局,使中国在体量上不断增大。

2.以农耕为主的中原汉人在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的挤压下不断南移,开拓了南方并融合了南方众多少数民族,包括经济重心南移和政治中心东移等。

3.所有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和进行统治之后,几乎无一例外均与华夏农耕民族逐渐发生融合,最终融入“中华民族”之中。

从宏观上看,这也是中国历史演进的三个突出特征。由这三点,我们可以做一个归纳:从体量和外部形态上看,北方民族一浪又一浪地南下和入主中原建立政权,不断重组和扩大着中国的版图与民族格局,这直接成就了中国之大。

二、北方民族为何一浪又一浪入主中原?

从黑龙江的黑河到云南腾冲的“胡焕庸线”,是中国一条很重要的生态线。^②线的东南端属温暖湿润的“东南季风区”,物产丰富,人口稠密,适宜农耕。线的西北则属高寒和干旱-半干旱地区,主要为高原、草原、大漠和戈壁,地旷人稀,大多数是不适宜农耕的区域。从这条线来看中国历史,我们可发现,历史上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无一例外均来自“胡焕庸线”的西北端,来自中国第一、第二阶梯即干旱-半干旱地带及青藏高原高寒地带。其次,在中国历史上所有分裂时期中,我们均可发现这条线在隐隐地发挥作用,即农耕民族建立的政权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东晋、宋、齐、梁、陈以及五代十国和宋辽夏金时期的南方十国、两宋、大理等政权大多分布于这条线的东南。

北方民族的南下与其所处生态环境有极大关系。在干旱-半干旱地带,北方民族以游牧、狩猎为主要生计方式。游牧经济是一种相对单一、脆弱的自然经济,且不能完全自给自足。首先,游牧经济要求在“人、畜、草”三者之间建立一种平衡,若人口增长,对畜、草的需要就会相应增大,此模式决定了北方民族对地域的需求欲望远比农耕民族要大。其次,游牧经济产品种类单一,数量有限,必须与农耕地区交换产

^①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第8页。

^② 参见胡焕庸《中国人口之分布:附统计表与密度图》,《地理学报》1935年第2期,第33-74页。

品方能实现其价值。其三,游牧经济的脆弱性还表现于对自然的依赖较农耕经济更甚,人们必须冬夏之间季节性逐水草而居,财富积累也主要以牲畜来体现。但牲畜在季节变换中极不稳定,呈现“夏饱、秋肥、冬瘦、春死”的规律性变化。春季是一年中牲畜最脆弱的季节,如果此时气候寒冷干旱,草该长的时候没长出来或者遭遇大雪覆盖,牲畜就会大量死亡,对游牧经济形成致命打击。所以,在游牧社会中,人口增长、社会上升与发展带来物欲增加以及与农耕地区的交换受阻、遭遇干旱寒冷等自然灾害,均极易导致其向农耕地区发起以掠夺财富为目标的攻击。善骑射、易组织和因食肉而体魄强健等特点赋予他们极强的攻击性和扩张欲,加之其向农耕地区发起的攻击大多基于生存所需,故动力十足。因此,面对北方民族的南下与攻击,中原地区农耕民族往往难以抵御和抗衡。

学界的研究已表明,历史上北方民族的阶段性南下与气候周期性变化之间存在着大体同步的共振关系。竺可桢先生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指出,中国历史上有四个寒冷期:一是殷末周初,二是南北朝时期,三是南宋时期,四是明末清初;有三个温暖期,即春秋到秦汉、隋唐和元初。^①因而提出中国历史上分裂和统一的交替,其实都和气候变化存在一种同步关系。其后,又有学者在此基础上将中国两千年来的气候变化分为三个寒冷期和三个温暖期。第一个寒冷期为东汉末到魏晋南北朝,第二个寒冷期为五代时期,第三个寒冷期为元明清;第一个温暖期为秦汉时期,第二个温暖期为隋唐时期,第三个温暖期为两宋时期。^②王会昌将气候变化和人口迁移情况进行对照,发现北方游牧民族阶段性南下与气候周期性变化存在着明显的共振关系。^③气候变冷、干旱少雨使处于干旱-半干旱地带的游牧民族面临牧草枯竭、水源干涸、生态环境恶化的严重威胁,遂向南部的中原农耕地区发起强有力的进攻。

欧洲和亚洲北部均为草原地带,被称作“欧亚草原”,二者相通、相连,“丝绸之路”即横穿整个欧亚草原。事实上,欧洲文明的发展也同样遭受北方游牧人群的强烈冲击。强大的罗马帝国就是被从事游牧的“北方蛮族”摧毁的。由于“北方蛮族”攻击力极强,几乎无法战胜,欧洲人把他们称作“上帝之鞭”。^④其实在中国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同样存在一条“上帝之鞭”,这就是从北方草原、森林地带不断南下的游牧民族。中国历史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乃是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交融的历史。对于这一点,一些从整体视野尤其是侧重从内陆边疆角度研究中国历史的西方学者已

① 参见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第15-38页。

② 参见王育民:《2000年来气候变化》,《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00年第4期;郑景云、王绍武:《中国过去2000年气候变化的评估》,《地理学报》2006年第1期。

③ 王会昌:《2000年来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南迁与气候变化》,《地理科学》1996年第3期。

④ 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页。

有充分认识与阐述。例如美国学者拉铁摩尔就指出：“通晓中国历史的关键之一是了解中国和它周围‘夷狄’地区之间势力消长的状况”。^①这是十分精辟的认识。

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汇中,有一个问题颇值得我们思考。一般来说,农耕文明由于定居和人口稠密,而且财富相对丰富且易于积累,往往发展出较复杂的社会体系及与之相对应的文化、观念、礼仪等。相比之下,游牧文明因迁徙和流动性大、财富有限且不易积累,又地旷人稀,社会组织相对简单,文化、观念及礼仪的发展程度往往远逊于农耕文明。因此,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农业民族常以“文明”“先进”自诩,在他们眼中游牧民族通常被视为“野蛮”和“落后”。过去我们通常刻板地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是“文明”引领“野蛮”,“先进”带动“落后”。但在鲜活的历史中,我们看到的情形往往并非如此。事实上,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互动中,游牧文明一方往往更活跃并居于主动,通常是游牧文明以极强的攻击性对农耕文明发起冲击和挑战,游牧文明一方往往是通过强有力的攻击、劫掠乃至摧毁或重组农耕文明来获得自身的发展。此外,在以农耕文明为中心的所谓“文明”与“野蛮”的分野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形:高度文明与富裕的物质生活常常衍生享乐腐化与颓废,严重消弭其动力;物质条件匮乏地区被视为“野蛮”“落后”的游牧文明一方则具有强劲充沛的生存动力和坚韧耐劳之品质。故在欧亚的历史发展中,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文明”“先进”的农耕文明引领被视作“野蛮”“落后”的游牧文明,恰好相反,往往是“野蛮”“落后”的游牧文明不断发起对农耕文明的攻击与劫掠,通过冲击甚至摧毁和重组农耕文明来获得自身的发展,从而为富饶的农耕地区注入强大的生机和动力。陈寅恪先生在谈到唐朝恢宏博大气象时说“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②所指正是这种情况。

当然,民族融合过程是有代价的,往往充斥着民族间的战争、征服、杀戮与强制等,伴随着痛苦与厄难。但在民族融合之后,却带来巨大的生机与活力。历史的演进就这样,总是具有两面性,发展总伴随着代价,这是人类社会演进无法逃脱的规律。

三、华夏农耕民族靠什么应对北方民族的冲击与挑战?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年)曾提出一个理论,即“挑战一应战”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文明的发展过程中需要一些外部的挑战或冲击,如果没有挑战或冲击,这个文明将陷于停滞并渐渐趋于死亡。但如果挑战或冲击超过该文明的承受能力,则该文明会迅速地趋于死亡。只有那些挑战程度适中或

^① 拉铁摩尔夫妇著,陈芳芝、林幼琪译《中国简明史》,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0页。

^②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03页。

者能够调整自身适应挑战的文明才最终可以生存下来。^①

按照这个理论,一个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需要有外部的挑战与冲击,只有在挑战程度适中且该文明可以自身调整以适应挑战的情况下,最终才能生存和延续下来。那么,历史上面对北方民族的强大挑战与冲击,华夏农耕文明如何应对北方民族的挑战与冲击呢?

毫无疑问,北方民族的挑战与冲击在一定时期给华夏农耕文明带来巨大破坏,也给农耕民族带来痛苦与磨难。但是,北方民族的冲击与挑战却并未造成华夏农耕文明的毁灭与中断,也未使农耕民族衰落和消失。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形是,历史上所有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和进行统治之后,最终都与华夏民族逐渐发生融合,成为源源不断汇入中华这一庞大机体的新鲜血液,起到了壮大和增强中华文明的作用。面对北方民族一浪又一浪南下入主中原,面对北方民族的巨大冲击与挑战,华夏农耕民族既未毁灭,也未衰落,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能够通过和北方民族的融合来化解和消弭这种巨大的冲击与挑战。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力量和原因促成了华夏民族与北方民族之间的融合?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笔者认为,这大致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华夏民族有极强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包容力。

钱穆先生说过两段非常重要的话:

《春秋》的学者所谓“诸夏而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而进乎诸夏则诸夏之”,此说决不错,而夷、夏界限在“文化”不在血统,即此可证。^②

又曰:

依照中国人想法,天时、地理、血统不同,民族性不同,均不碍事。只要有一番教化,在此教化之下,有一番政治,“教化”与“政治”便可形成一个文化而发出大力量来,自然可以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自然可以尽己之性而尽人尽物之性;自然可以会诸异于大同,而天下自达于太平之境。试问此是中国文化理想中所含蕴的何等见识,何等抱负?宜乎在此文化大理想之下,可以形成一伟大无比的大民族,而直传至今依然坚强不衰,刚毅不屈。在将来,它依然会发生大作用。”^③

钱穆先生研究中国历史造诣极深,对中国历史与文化有深刻史识与洞察力。以上其所言,道出了华夏农耕民族观之本质——夷、夏之间的界限在“文化”而不在血统,只要加以一番“教化”,“夷狄”(历史上华夏民族对北方游牧民族的称谓)可以转

① 汤因比著,曹未风等译《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4-200页。

② 钱穆《中华文化十二讲》,《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8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66页。

③ 钱穆《中华文化十二讲》,《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8册,第67-68页。

化为“华夏”。同时,这种民族观还认为,华夏人如果不加以教化,也可转变为“夷狄”。换言之,“华夏”与“夷狄”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这是一种具有极大胸怀、气魄的开放的民族观,这种民族观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形成。其时,华夏人所言“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所谓“文德”即指文化、“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以夏变夷”、“有教无类”等观念,都是这种民族观的生动体现。华夏人的民族观产生之依据,在《三字经》中的一段话中得到很好的诠释“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①这说明在华夏农耕民族观念中,不管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文化和什么样的民族,都是“性相近,习相远”,这是一种从“人性普同”来看待不同文化的思想观念。既然不同民族和文化均是“性相近,习相远”,那么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就不成为问题,成为问题的乃是“苟不教,性乃迁”。所以在华夏农耕民族的民族观念中,“教化”是关键。这正是华夏农耕民族之民族观的核心。从很大意义上说,正是这种“重教化”而“不重习俗差异”的开放的民族观,使华夏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融合成为可能。这种民族观,乃根植于华夏民族极强的文化自信。

第二,华夏地区很早就形成了“天下国家”的政治传统,在这种政治传统下,国家“无边界”并包容四方。

在古代,“国”是一个相对有限的政治范围,真正的中国概念实际上是“天下”“四海”“海内”。“天下”既包括中原地区,也包括四边“夷狄”地区。所以在很大意义上,古人话语中真正与今之中国概念相对应的词,并不是“国”,而是“天下”。故孟子说“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②

“天下国家”政治传统形成甚早,《诗经·北山》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③春秋战国,诸侯王自称“孤”和“寡人”,均是这种政治传统的反映。

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规定“天子自称曰朕”,含义为天下第一人,以表明其为“天下共主”“君临天下”等意。“天下国家”的政治传统自秦统一后基本形成,并一直延续至清朝。在此政治传统下,皇帝自拟“天子”,君临天下,王朝也自诩“天朝”。此理念也深刻影响并植入以入世为特点的儒家文化传统。儒家政治理想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及“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理念均是“天下国家”政治传统的生动反映。

最能说明“天下国家”政治传统的例子,是清乾隆时期英国使节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年)到访。马戛尔尼率英国使团来到大清,名义上是给乾隆皇帝祝寿,实质是为了拓宽与清朝的贸易。但在面见乾隆皇帝的礼节上却遭遇麻烦,面

① 李逸安注解《三字经》,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页。

②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尽心章句下》,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28页。

③ 程俊英、蒋见元著《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643页。

见皇帝需要下跪,最后经谈判和磋商达成单腿下跪的折中方案。该事件说明,清朝自视为世界中心,在清朝眼中,一切正式来访者都被视为“朝贡”行为。这是当时清朝对世界的看法,也是“天下国家”政治传统的体现。

正因为“天下国家”政治传统将自己视为“天下”中心,由此派生出“怀柔远人”的朝贡体制。在这种传统之下,由于“天下”是一个极模糊的概念,“天下”是无边界的,大体上并无明确的“边界”意识,也不太看重“边界”,至少在文化和心理上并不自设“藩篱”,而最喜“万邦来朝”“兼容八方”,看到对周边“四夷”的巨大影响力。这种不自设“边界”的“天下国家”的政治传统产生了一个重要作用,即客观上使华夏农耕民族与北方民族之间的融合成为可能。

第三,华夏农耕地区悠久而厚重的文化与文字之伟力

中国历史的一个普遍规律,是北方民族凭借强大武力一浪又一浪地南下入主中原,他们是军事上的征服者,但假以时日,却最终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逐渐与中原农耕民族在文化上融为一体。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这颇值得深究。我们可以从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的差异来进行思考。游牧社会的基本特点是比较简单和单一,地旷人稀,流动性大,社会稳定性较弱,无论是文化积淀与发育程度均远逊于农业社会。相反,农业社会由于定居和人口稠密,社会稳定性和复杂性远胜于游牧社会,文化易于积淀、延续和充分发育。所以,当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农耕地区以后,虽然是军事上的胜利者,却总难以避免地会接受华夏农耕区域的文化,逐渐被这种文化所浸染,走上与农耕民族相融合的道路,此其一。其二,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后,要统治中原地区及其人民,也必然选择同汉人世家豪族与官僚士人合作,在其协助下恢复原有的统治秩序与资源系统。这也使得北方民族尤其是统治上层不得不产生主动学习、吸纳华夏农耕地区政治与文化之强烈需求。这种需求成为促成其与华夏农耕民族发生融合的内在驱动力。

对北方民族而言,入主中原以后,中原地区丰富而精致的生活,衣食住行之享乐程度和易于获取的丰厚财富与特权,都为们所无法抗拒。这不可避免地使其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迅速“中原化”。就人性而言,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在一两代人后,大多已回不到从前。这同样成为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后难逃“中原化”的宿命。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入主中原建立政权的北方民族,因靠特权获得某种优势地位,锦衣玉食,过上衣食无忧的优越生活,成为寄生阶层,往往不治生业,终日游手好闲,数代之后,不仅当年入主中原时的勇猛强健英姿不再,且生存能力严重退化,作为特殊群体渐渐趋于衰落。当时代和政权变换后,大多沦落为普通平民阶层,同样逃不掉“中原化”的宿命。

北方民族入主后逃不掉“中原化”宿命的另一因素,则在于中国文字之伟力。费

正清曾指出：“中国之能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有一部分应归功于他们的文字。”^①他认为，中国如果使用拼音字母文字，可能早就像欧洲那样分裂成许多国家了。这是颇具洞见的判断。中国地域辽阔，文化多样，从北到南，从东到西，语音和方言差异极大，北方人到南方根本听不懂闽南话、江浙方言和粤语，但因使用共同文字，均以共同文字为发音基础，所以，只要诉诸文字，写出来就都能明白。故汉字成为历史上各民族之间文化联系的纽带，也是各民族、各语言之间沟通交流的工具。这也使北方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后，为了有效地统治中原地区，不得不在汉人士大夫的帮助下努力学习以汉字为基础的汉文化。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学习语言文字，同时也是接纳该文字所承载的文化及思想观念并受其濡染的过程。此过程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潜移默化，但却往往是决定性的。历史上，北方民族（尤其是上层统治者）入主中原后，普遍在汉人士大夫帮助下学习汉文经典及前朝历史，其造诣甚至不逊于许多中原帝王，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② 中华文明之得以代代相传、绵延不绝，很大程度应归功于文字所发挥的作用。正因为从古至今，以视觉符号为基础的中华文字系统一脉相承，今天的小学生仍能读懂三千多年前孔子《论语》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正是文明延绵不绝的结果。

四、民族融合是中华民族得以凝聚、中华文明得以绵延之根本

从以上三点来看，无论是极强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包容力，还是“无边界”并包容四方的“天下国家”政治传统、悠久而厚重的文化和文字之伟力，均赋予华夏文明以强大的韧性和巨大的文化包容力。强大的韧性使其能够应对和抵御北方民族的冲击与挑战，不致在这种冲击与挑战面前毁灭和走向衰落；巨大的文化包容力和开放的民族观，却是决定性的文化力量，它使华夏民族在与北方民族的冲突和战争过程中，能够与之相互交流、彼此影响并逐渐相互接纳，经过一段时期的混杂与和平相处，使双方逐渐发生融合。可以说，民族融合正是华夏农耕民族化解和消弭北方民族冲击与挑战的主要方式和路径。如果说华夏民族与北方民族的融合之所以成为可能，在于华夏文明及华夏民族具有强大的韧性和巨大文化包容力，那么历史上北方民族源源不断南下入主中原，则成为推动民族融合的重要力量。

北方民族一次次大规模南下，虽造成中原板荡，给华夏民族带来极大痛苦，但北方民族一旦在中原立足并建立政权，却不得不选择与中原官僚阶层及士人进行合作，在他们的帮助下恢复中原地区原有的政治、经济秩序，对中原地区农耕民族与百姓进

^① 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3 年版，第 23 页。

^② 钱穆《国史大纲（上）》，《钱宾四先生全集》第 27 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8 年版，第 312 页。

行统治和管理。这样,北方民族与中原官僚阶层及衣冠之士的合作就不可避免。例如十六国及南北朝时期北方胡人建立的政权中即吸纳了大量中原士人,“北方世家大族未获南迁者,率与胡人合作”是当时的普遍现象。史籍中关于胡族统治者不遗余力地网络、寻求衣冠士人的记载比比皆是。无论十六国,还是北魏、北齐、北周,均有相当数量中原衣冠士人参与权力中枢,他们为胡族统治者所倚重并发挥着关键作用。^①在这样的背景下,北方民族及所建立的政权,受中原文化熏染而逐步走上“中原化”道路即不可避免。

其次,北方民族一次次大规模南下,由此形成的巨大挤压,也导致中原农耕民族大规模南迁,即史籍中所谓“衣冠南渡”。这客观上不仅带来对长江以南地区的开拓、发展与繁荣,也促进了中原农耕民族与南方各民族的广泛融合。所以,长江以南地区的发展和民族融合,事实上是在北方民族不断南下和入主中原的挤压下逐步实现和完成的。

另外,北方民族入主中原所带来的冲击和战乱,也造成中原农耕地区的大量居民向四周扩散,如西晋末年中原战乱之际就有大量的中原人群向周边地区扩散迁徙。除向南方迁徙外,他们也大量流散到今天的西北、东北及西南地区,不但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开发,也与这些地区的各民族发生广泛的交流与融合。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大致可分三种情况。

第一,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同中原农耕民族之间的融合。由于北方民族入主中原源源不断,且规模巨大,所以这成为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主流。

第二,在北方民族不断南下的挤压下,中原农耕民族不断向长江以南地区迁徙,促成中原农耕民族与南方各民族的融合。

第三,北方民族南下的战乱和冲击,也使中原农耕民族大量扩散到东北、西北和西南等周边地区,并与当地民族发生融合。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北方民族源源不断地南下,成为民族融合的主要推动力量。不但促成他们与中原农耕民族的融合,推动中原农耕民族南迁及与南方各民族的融合,也促成了中原农耕人群向周边地区的扩散及与当地各民族的广泛交流与融合。

此外,还有一种情况,每遇大的自然灾害、饥荒及兵荒马乱、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之时,中原地区人群出于生存、避险的需要,也大量逃往偏远的由土司管辖的地区,逐

^① 对衣冠士人在北方政权中发挥的作用,史籍不乏记载。如《晋书·载记第五石勒下》:“成勒之基业,皆宾之勋也”,参见《晋书》卷105《石勒下》,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756页。《晋书·载记第十三苻坚上》:“王猛亲宠愈密,朝政莫不由之。”参见《晋书》卷113《苻坚上》,第2885页。《魏书·崔浩传》记拓跋焘告臣下曰:“凡军国大计,卿等所不能决,皆先谘浩,然后施行。”参见《魏书》卷35《崔浩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19页。《魏书·李孝伯传》:“军国之谋,咸出孝伯。”参见《魏书》卷53《李孝伯传》,第1172页。

渐落籍于当地,融入到当地民族之中。

中国历史上民族冲突与战争虽持续不断,但化解这种冲突的主要方式与路径,却是民族融合。民族融合不断化解和消弭民族之间的冲突与隔阂。所以,若从“民族”的角度来审视中国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事实:民族融合乃是中国历史的主流。

中国历史演进中的“分裂”与“统一”交替,很大程度也受到民族因素的支配。分裂往往由民族冲突所造成,而长期的民族融合以及融合之需求则往往成为构建“统一”的强大动力。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梁启超指出“民族为历史之主脑”。^①顾颉刚也以对中国历史深刻洞悉,指出中国历史的主流是内外的民族融合。^②正因为民族融合是中国历史的主流,所以中国历史上民族交往与融合的总体趋势,是朝着民族关系愈来愈密切、愈来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方向发展。这一点,前辈学者已做过精辟阐述。例如,翁独健先生指出:“如果说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有主流的话,主流就是各民族日益接近,相互吸取、相互依存。”^③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交往与融合是朝着彼此依存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密不可分整体方向演进。那么,这个彼此依存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密不可分整体是什么?这正是近代梁启超提出的“中华民族”。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作了更精辟的概括:“一部中国史,就是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历史。”^④

民族融合不但是中国历史的主流,也是中华民族形成与凝聚的根本,更是中华文明得以绵延不绝、生生不息,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的关键所在。如果说中华民族的凝聚、壮大的根本机制与原因在于民族融合,那么民族融合之成为可能并持续不断,其精髓正在于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包容与相互接纳。从此意义上来说,中华民族的凝聚与发展,正是历史上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包容、彼此接纳的结果。

五、中华民族聚合的地理条件:内向型地理环境

中华民族形成与聚合,还离不开一个重要条件,这就是内向型地理环境。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悠久的历史 and 未曾断裂的文明。中国之所以能成为自成体系且延续数千年的文明古国,和它的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

中国地处东亚地理板块,该板块的一大特点,是自成一体并相对封闭。它北面是广袤的草原,而且越往北纬度越高、越寒冷,是被称作“西伯利亚”的极寒区。它的东

①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6页。

②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13日。

③ 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绪论》,载牛森主编《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3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

④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9年9月28日。

南方向是大海,对中国而言,海洋的作用是近代才显现的,之前主要是静止和封闭空间。它的西南部则有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绵延数千里的喜马拉雅山脉构成了与南亚之间的巨大地理屏障。古代中国通向外界主要有两个较便利的出口:一是去往东南亚地区,但在古代,东南亚社会发育程度低,地理环境多山且崎岖不平,部落及资源分散,对中国缺乏足够吸引力;二是翻越准噶尔大裂谷的阿拉山口,进入中亚地区,通过欧亚草原地带向西通往西亚和欧洲,此即我们今天所说的“丝绸之路”。但穿越欧亚草原通往西亚和欧洲的路程漫长而遥远,沿途主要是草原、戈壁、沙漠,人烟稀少,并非农业民族所擅长通行的道路。因此,中国所处地理环境,乃是一个自成一体并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

此外,中国地理环境总体上是西北高、东南低,并由三大地理阶梯所构成。第一阶梯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第二阶梯是包括蒙古高原、黄土高原等分布着大量草原、沙漠、戈壁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第三阶梯则是最宜居、最富庶、人口分布最密集的黄河、长江的中下游流域地区。这一基本地理格局,奠定了中国数千年历史演变的一个基本趋势,周边各民族尤其是处于第一、第二阶梯即“胡焕庸线”以西地区的民族,势力一旦崛起壮大,其社会处于急速上升的发展期,他们必然朝着黄河、长江中下游流域地区发起进攻,一方面是为获取该地区丰富的资源,为该地区高度的文明所吸引,同时也争夺更优的生存与发展空间,这便是史书常说的“逐鹿中原”“问鼎中原”。而周边民族每一次“逐鹿中原”,均带来中国各民族的大融合与相互杂糅:一方面入主中原的民族与中原民族发生交汇融合,另一方面迫使中原民族人口大量向周边地区迁移、扩散并与周边地区民族发生广泛杂糅与融合。这种融合模式持续数千年,可以说贯穿了中国历史的始终。因此,在自成一体并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中国各民族有充分的混合与交融机会,由此逐渐形成文化的共同性,并基于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共同命运而产生共同体意识。所以,在中国疆域内的各个民族,没有一个民族是“孤岛”,没有一个民族是完全孤立和封闭发展的。每一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与周边尤其是中原地域各个民族发生过交融,只是程度各异罢了。顾颉刚先生指出:“汉人的生活方式所取于非汉人的一定比较汉人原有的多得多。”^①“北方人谁敢保证其无胡人的血统,南方人谁敢保证其无百越、黎、苗的血统。”^②并认为“汉人是许多民族混合起来的,……汉人体质中已有了许多蒙、藏、缠回的血液”。^③所指的正是这种情况。当今中国56个民族彼此在血统、文化、信仰、价值观和历史记忆等方面均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每个民族在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的各个方

①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13日。

②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13日。

③ 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益世报·边疆周刊》第20期,1939年5月8日。

面,都有许多因素取之于别的民族。中国各民族成为相互交融、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凝聚成为中华民族,同内向型地理环境有极大关系。

六、结语

从“民族”角度来看待中国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这样几个特点。

1.中国的历史发展,虽伴随着民族之间的冲突、战争、征服与强制等,但其带来的结果,却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汇聚和融合。从宏观角度来看,民族融合正是中国数千年历史发展的主流。

2.华夏农耕民族与北方民族的冲突与交融,不断重组和扩大着中华文明的格局。北方民族源源不断地南下入主中原,不仅扩展了历史上中国的版图与民族格局,也成为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主要推动力量。

3.民族融合是中华民族形成与凝聚的根基,也是中华文明得以绵延不绝、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的关键所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之所以成为可能并持续不断,其精髓在于文化包容。中华民族的产生,正是历史上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包容、彼此接纳的结果。

(作者石硕,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教授。成都610041)

(责任编辑:周陈)

historical process, one should value the positive side of Sima Qian's national consciousness.

Key Words: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Guandai; Yidi; cultural gene; benefit of Hu dress; LI Ling; differences between Four Barbarians

The Unification and Evolvement of Chinese Nation: Understanding Chinese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

(Sichuan University)

SHI Shuo (87)

The Chinese nation is made by history; and it is the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istory. Following the logic of the "expansion" and "continuity" in Chinese history,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ohes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specifically the issues regarding the mechanism of integration and fusion between agricultural Huaxia and nomadic Northern ethnic groups, and the promotional effect of Northern ethnic groups migrating southwards on national integration. It asserts that national integration is the mainstream of Chinese history, and that historically speaking, the fundamental trend of integration and fusion between various ethnic groups is to evolve into an entirety in which ethnic groups are getting increasingly interdependent and inseparable. This entirety is known as the "Chinese nation" today. Integration is the fundamental basis of the making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is also the key to the continuity, everlasting vitality and vigor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nclusiveness is the essential and core element that made integration possible and continuous in Chinese history. The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the result of the inclusiveness and acceptance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nd cultures in Chinese history.

Key Words: Chinese nation; Huaxia farming ethnic groups; northern ethnic groups; national integration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n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Yunnan University)

LIU Zheng-yin (102)

As an integrated entirety with close internal connection, the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akes its shape as the river of history flows, and develops and solidifies itself alongside the common development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China. Ever since the origin, an internal connection exists among various ethnic groups living on the vast land of China and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bsorption and integration as well as a common trend of unification. A relatively stable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akes its shape after a long term of exchanges,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the Dynasties of Xia,